

# 中东欧国家周报

## 【波黑社会周报】

### 萨拉热窝的首次“骄傲游行”

**Ivica Bakota**

**(2019年9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 【波黑】萨拉热窝的首次“骄傲游行”

4月，波黑的LGBTIQ（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等性少数群体活动家宣布将于9月8日在萨拉热窝首次正式举行“骄傲游行”（Pride LGBTIQ parade）。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各式各样的讨论，但很少听到官方的声音。波黑“骄傲游行”的口号“Ima izac”可以粗略翻译为“马上出去”，正如人们在错过公交车车站时发出的呼喊那样，近期的首次“骄傲游行”以此为口号恰如其分。

在4月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主要组织者们（再次话中带刺）地表示：“这个国家的LGBTIQ群体争取平等权利正处于紧要关头。”萨拉热窝新闻门户网站还报道了主要组织者之一勒耶拉·乌雷莫维奇（Lejla Huremovic）的讲话。他称“骄傲游行”是“强有力的政治工具，可以让个人和群体争取权利自由的抗争发生急剧变化。他们当前正面临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歧视和暴力。”

不出所料，游行公告发布后，社交媒体出现了高度分歧的反应。就像其他地区的首府首次举行骄傲游行时那样，社交媒体和公众舆论通过“脸书”（Facebook）或者“照片墙”（Instagram）的帖子吸引了数百个回应：从公开呼吁反对针对参加者的暴力到支持和承诺参加游行的帖子不一而足。据推测，首批声援来自国际代表、波黑大使馆以及该地区的LGBTIQ性少数平权组织。然而，相关报道显示，在“骄傲游行”筹备工作中，来自当地公众人物、自由派政治家和名人的支持已大为减少。政客们也不愿通过发表评论来表达自己的个人见解，并且大多数人都退缩到平淡无奇的官方声明背后，承认每个公民都有权集会和选择自由。

可以想见，媒体将报道社交媒体上最极端的帖子。支持者和活动参与者主要包括LGBTIQ个人以及来自班尼亚卢卡（Banja Luka）、图兹拉（Tuzla）、泽尼察（Zenica）和其他城市地区的少数“自由先锋派”人士。主流社交媒体网站上大量引用和分享他们的观点，但是反对游行的群体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当地信息门户网站、右翼团体和足球俱乐部支持者的“脸书”（Facebook）主页呼吁对“骄傲游行”的参与者施加暴力，并

“将这些垃圾赶出城市”。就同一话题，他们将提倡无视同性恋话语的民粹主义和保守论证交织在一起，还呼吁对性少数群体处以私刑。大多数评论都“足够慷慨”，承认每个人都拥有生存和选择性取向的权利，但反对“任何”公开出柜的行为，反对以“侵略性”生活方式威胁“普通和正常”的人。通过仔细浏览反对“骄傲游行”团体和同情性少数群体者发布的帖子，人们可以发现，在波黑大部分异性恋者的灰色地带里，混杂着虚假的男子气概和公民的冷漠感。这一点对于被通称为巴尔干的其他社会来说也同样如此。

要求组织“反抗争”活动的呼声也具有代表性。9月初，至少有3项“反抗议”活动作为9月8日“骄傲游行”的后续行动被公开宣布。来自萨拉热窝的神学家萨宁·穆萨（Sanin Musa）同时呼吁对“骄傲游行”进行和平抗议，声称这“违背了传统的基本男女关系”，并质疑“恋童癖、恋兽癖、恋尸癖”是否也应当被允许抗争。这位神学家坚持“和平包容”的“反抗争”，意味着欢迎所有种族和具有宗教背景的人加入该项“反抗争”活动。另外一个总部设在萨拉热窝的名为“浅淡”（Svjetlo）的非政府组织宣布了另外一项保守的“反抗争”活动，性少数群体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冲击也煽动了这一活动。“青年穆斯林”组织表达了他们的“厌恶”，并呼吁当局“允许人们表达他们对这次‘骄傲游行’的真实看法”。

尽管直至游行前的最后一天仍不清楚是否还会有非正式和极端主义的抗议者聚会，但其他首都第一次组织“骄傲游行”的经验表明，看似和平的“反抗争”活动可以作为各种娱乐支持者俱乐部的跳板和其他极端分子的暴力煽动工具。这就是地方州政府要求采取高度安全措施的原因，他们沿游行路线派出了约1500名警察，并要求组织者确保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并购置障碍物。该问题引起了持续至今的广泛争议。活动家和组织者认为，地方政府应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活动的安全，并引用了《州公共集会法》。该法规定，对每项非商业性活动（抗议），警方均应承担保障活动安全的全部责任。但是，州政府官员随后就是否需要确保“附加”（因此由组织者提供资金）安全措施发表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声明，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出于安全考虑，游行最终可能被取消。

## 缺乏非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与该地区（巴尔干）的其他第一次“骄傲游行”相比，波斯尼亚在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据报道，参加者从铁索元帅街出发，游行至波黑共和国广场（国会大厦前）。大约有 500 人参加了游行，其中包括来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 LGBTIQ 支持者。但是，当地媒体注意到，包括现任官员在内的政客大多既没有就这一消息发表评论，也没有在“骄傲游行”前夕做出表态。相对而言，该地区的每个国家都有不支持或持反对意见的领导人或官员，但各国政府很少错过能够被欧洲监督机构称为进步和自由主义的机会，并适当地表现出它们置身于西方价值观的共同体之中。在 2001 年贝尔格莱德（Belgrade）首届“骄傲游行”期间，金吉奇政府被认为是坚定的“亲西方”派。类似活动在 2002 年萨格勒布（Zagreb）“骄傲”运动中获得了克罗地亚左翼联盟、2013 年在波德戈里察（Podgorica）获得了 DPS（民主进步党）政府，而今年 6 月在斯科普里（Skopje）获得了 SDSM（社会民主联盟）政府的支持。

那么，波黑政客为什么不愿意表明个人态度？其原因与以下事实有关：波黑是最近才首次举行“骄傲游行”的国家（在 2001 年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之后 18 年），并且这通常会被归因于战争结束以来持续的社会重新传统化，即普遍存在的种族民族主义，这放慢了社会变革的步伐，并使人们担心社会内部存在极端分子。

多数的专家意见都强调了第二个原因，即种族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战争后接受有关社会进步的新观点，而是“培养了异性规范，严格的父权制，以家庭为中心的观念”作为支持其民族主义议程的手段。正如波斯尼亚记者亚历山大·布雷萨尔（Aleksandar Brezar）解释的那样，“他们（三个种族民族主义政党）说服民众，让他们相信繁荣与进步指日可待——如果他们再次拥护民族主义、传统价值观就会受到前政权的阻挠。如此一来，传统、宗教定义的规范和基于种族的认同的所有反对者实际上都被他们视为贱民。”尽管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和塞族政治代表选择对游行保持沉默，但只有 SDA 官员表示：如果游行是在班尼亚卢卡（Banja Luka）或蒙斯塔（Mostar）组织的，那么他们个人对“骄傲”目标的厌恶，就会受到 HDZ 或 SNSD 成员传统主义规范言论的青睐。

结果，波黑社会的普遍再传统化变得无处不在，尤其是在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位匿名人士的回应作为例证，他说：“（作为一名同性恋）在萨拉热窝生活很容易，但你在波黑的其他地方出柜试试。”同时，法律框架的推进也很缓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政府直至2018年10月才批准同性婚姻合法化，正如联邦调查局局长法蒂尔·诺瓦利奇（Fadil Novalic）承认的那样，这完全是波黑在加入欧盟过程中承担义务的一部分。

在2015年，由Era（用工风险评估）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波黑在包容LGBTIQ团体方面处于落后状态。75%的性少数者承认曾遭受言语虐待，其中还有15%是人身暴力的受害者。一些媒体门户网站对组织“骄傲游行”进行了民意调查，要求用户在“支持”、“不支持”和“对我都一样”之间进行选择。根据具有全国影响力的N1电视台首批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不到30%的人表示支持，而61.8%的人表示“不支持”。这些数据只是部分展现了波黑民众对LGBTIQ不友好、不接受的态度。

重新传统化和不合作的精英阶层与极端主义密切相关，这种极端主义带有宗教或种族色彩，通常是由足球流氓带来的。2008年萨拉热窝“酷儿”（不拘泥于标签的性少数）节是一次公开支持LGBT的聚会，成为了宗教极端分子和足球流氓袭击的场所。2014年，他们针对另一个“酷儿节”的群体发动了类似袭击。最近，在图兹拉（Tuzla）举行的LGBTIQ事件被当地暴民骚扰。此外，根据LGBTIQ群体的说法，未被记录在案的攻击、骚扰和恐袭事件的发生率仍然很高。

波斯尼亚的首次“骄傲游行”成功地保持了和平氛围，未发生任何寻衅滋事行为。但是，在过去20年中，波黑社会是否陶醉于这种民族传统主义？这个问题因游行出乎意外的和谐而被忽略。作为波黑的首次游行，这次游行极具挑战性：直接面对并承受来自社交媒体的威胁和暴力；作为该地区近期的游行，有望消除围绕波黑停滞不前的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在政府危机持续时期走上街头，迎合世界主义的氛围，8月的萨拉热窝在电影节之后迎来了第一场“骄傲游行”，以应对第一个挑战。至于第二个，尚需时日才能看到发生改变。

（作者：Ivica Bakota；翻译：卢依婕；校对：李罡；审核：刘绯）